

# 规划学核心概念

Key Concepts in Planning

〔英〕加文·帕克·乔·多克著

冯尚译

# 规划学核心概念

Key Concepts in Planning

---

[英] 加文·帕克 乔·多克 著

冯尚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划学核心概念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书名原文: Key concepts in planning

ISBN 978-7-5499-3640-3

I. ①城… II. ①张…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493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Gavin Parker, Joe Doak, 2012.

书 名 规划学核心概念

著 者 [英]加文·帕克 乔·多克

译 者 冯 尚

责任编辑 李明非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8 000 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3640-3

定 价 32.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

主 编 张鸿雁 顾华明  
副主编 王爱松

#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sup>①</sup> 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sup>②</sup> 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1.1。

②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sup>①</sup>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sup>②</sup>，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

<sup>①</sup>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3。

<sup>②</sup>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有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sup>①</sup>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sup>②</sup>。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

---

<sup>①</sup>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sup>②</sup>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46。

导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sup>①</sup>，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市化。所谓“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市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

<sup>①</sup>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sup>①</sup>，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

<sup>①</sup>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sup>①</sup>，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sup>②</sup>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变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这一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

---

<sup>①</sup> 张鸿雁等，《1949 年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sup>②</sup>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sup>①</sup>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sup>②</sup>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途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sup>③</sup>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

<sup>①</sup>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sup>②③</sup>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sup>①</sup>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年11月于慎独斋)

---

<sup>①</sup>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 目录

001	序
001	第一章 前言
014	第二章 规划与规划学
030	第三章 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
047	第四章 网络
059	第五章 系统与复杂性
072	第六章 层级制
085	第七章 实施
096	第八章 选定
107	第九章 利益与公共利益
118	第十章 协商
132	第十一章 流动性与可及性
145	第十二章 权利与财产权
157	第十三章 地方与地方感
172	第十四章 社区
184	第十五章 资本
196	第十六章 影响与外部性
207	第十七章 竞争力
218	第十八章 舒适
229	第十九章 发展
244	参考书目

---

## 第一章 前言

### 为什么写这本书？

规划学，作为一门研究科目，是跨学科最多的学科之一：其实践和理论横跨并利用了广泛的社会科学和其他影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话题，是一个无边的、动态的、有趣的研究和反思领域。此外，规划学的目的、活动和可能结果影响着我们大家。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以及规划学圈子内和跨学科的专栏家与学会成员，塑造并重塑了这里所包含的概念和使用这些概念的方式。这些观念和标签正在生机勃勃地塑造着实践活动，也被实践活动所塑造——它们是流动的，并向挪用敞开。因此这些概念以不同方式反映了规划学活动，并且可以用于认识规划学活动。在选择这些核心概念时，我们已然包含了为理解规划学活动提供基础观念，以及塑造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因素。规划政策往往反映了社会对资源利用的选择及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选择。

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而干（Emile Durkheim）主张，一个概念是在时空流变中提取的一个共有与抽象的表征。尽管这一看法听上去令人气馁，但它暗示概念不仅是随机的、不完善的，而且在

交流观念时是至关重要的。词典义表明，一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新观念，或是一个包罗其他抽象观念的概念。概念也能够被视为容易接近的理论与实践，或理论与实践的“压缩包”。由于多种多样的理由，它们不断地被各色人等进行交换和修订、使用和引用。因此，“冻结”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曾经影响规划学领域的基本观念的使用过程，释明其涵义，是有用的。对于既确保理解它们，又揭示它们的随机本质，在此将它们提出来是重要的。通过这样做，人们能够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定位”自己，并评估规划学之内的特殊实践活动。

这一任务是理解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广需要的组成部分——理论和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已被确立为规划学教育的核心元素（例如，RTPI，2011）。这大部分是因为，分析技巧与批判研究及解构实际的能力被广泛认为是规划师的重要工具。理论与实践之间通常有一种可以觉察到的分裂，而试图填平这一鸿沟也存在着极大困难。许多规划学书籍关注点集中在有关规划学的事实、规则和制度安排，而没有将这些情境化，或置于一个概念框架中。与此相反，学生惯常感到涵盖理论与方法的读本可能相当抽象并且脱离实际。这也许是因为理论读本倾向于将理论视为范式或概念库，用不易接受的语言写成，或要么看似与实践脱节。依我们的观点，通过对规划师们使用的或否则影响行动的核心概念做出更清晰的解释，这一状况能够得到改善。

除了标准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读本，很少有可供规划学学生使用的书籍，以便他们系统地探究规划师所需要的观念和结构性概念，以理解和运用理论，并有助于他们反思实践。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学”能够被条分缕析，并可以在此将核心概念网罗无遗；相反，对那些正在进入政策领域，并在政策领域主事的人而言（正是政策领域塑造或维持了这些概念的实用性），这些概念应该是指导性和启发性的。这些抽象概念的确形成了规划学的许多“操作逻辑”和规划学中争辩的一个基础。因此，对每个涉足规划系统、开发流程或土地利用政策的人，而且特别对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学生，我们希

望这一读本将会充当一册有用的参考书。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规划师需要能够把过程、正当理由和围绕他们周围的运营环境进行概念构想。与其成为专家，或拥有学富五车却一筹莫展的“专业知识”，我们的观点是，21世纪的规划师需要能够理解和“安置”其他人的专业（和普通的）知识，然后进入开放且清晰的思考和决策。这种开放观点部分涉及与规划学有关的观念、驱动因素和难题，以及对环境变化的管理。

本着这一精神，在英国关于规划学的一本标准的引论性课本里，它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说法：“去定义城市与乡村规划学的界线并不容易（或甚至有用）……规划政策（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远为广阔。此外，已经长时间为人们所接受的，‘空间规划学方法’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关联的重要性，现在被奉若神明”（Cullingworth and Nadin, 2006: 14）。这种感受强调并扩展了概念意识的重要性，将其当作观察空间规划学中（而且的确相当多地与规划实践相联）的关联、交叠和裂隙的途径。没有一个得到很好理解的、通过争论铸成的、仰赖切身使用砥砺的概念库，规划学实践不可能是强有力的或是有效的。可以更容易地建立起规划学的诸种概念和领域间的联系，更便利地确立起对问题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认知。

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覆盖范围是全面的，相反，我们对关键概念进行了选择和组织，以便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阅读，作为参考资料则可以以一组关键词或单个关键词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概念的章节里，指出连带的或交叉的观念。这强调了概念是以怎样的方式联系起来的，相同的观念在何处可以利用同义词或其他标签加以讨论。

## “为”规划学的概念与规划学“的”概念

这本书为了解塑造规划实践和研究的诸种概念提供指引（这些概念既是“为”规划学而设的，也是规划学“所有的”），并从规划学



“学科”之外逐步引入。一些概念在社会科学中被普遍讨论，并有十分广泛的适用性，而另外一些则从规划实践的活动和议题之中发展而来。在一些例子中，一些概念在传播时会有不同的涵义或别样的使用。本书中每个得到阐述的概念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背后的故事”，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概念的效用和局限，需要了解这类历史和故事。在阅读这些概念和相关解释时，读者应该能够思考这些预设，这些预设对这些概念尚在“脚本中”中时的情境施加了影响。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或“现成”的方案或认知。前见和经验与当下的情境结合在一起，将实际上形成理解。

阐述和商讨概念发展的持续过程，常常与实践和经验知识处于紧张状态。试图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话性关系，是一条诱人的原则，然而常常难以维持。执业规划师的确需要保持学者的敏感，如果他们要在未来几十年里有任何希望获得一种动态的、恰切的规划学方法的话，与规划学实践有关的学者和教师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不想让本书复杂化和过于理论化，学生理解下述术语仍是重要的。这不是因为它们明确出现在这一读本中，相反，从观察这一世界不同方式的角度来看，它们对消化吸收每一章的可能性起了一种提示作用。

阅读这一读本时，知识与方法三原则作为吐故纳新的工具能够派上用场：

首先是存在论意向这一观念——对知识、真理和合法性所取的态度，这种强调将研究“什么”。这为规划师们提出了一种责任，促使他们思考基于任何特殊理论所作出的或包含在任何概念的解释中的假定或经验上的预设。

第二条原则就是知识论透视法这一术语所最好概括的。这一标签意指，对这一世界进行概念化有不同的方法，研究这一世界也有不同的方法。个人很可能偏爱构成有效性的特殊方法、读物或参数。作为特别的教学风格的一个结果，或可能是社会化进程的一个结果，这可能涉及对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知识积累的投入和方法的明白无误的